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研究动态】	关于文革的回忆、记录和研究——近二十年进展综述	徐友渔
【往事非烟】	我所知道的“一打三反”运动	吴乃龙
【亲历者言】	文革中我给江青做秘书（二）	阎长贵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研究动态】

关于文革的回忆、记录和研究——近二十年进展综述

· 徐友渔 ·

按照大多数中国人的算法，2016年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发动50年，结束40年的周年纪念。在这一年，除了文革发生地中国大陆，在世界各地，关于文革的发言、研究论文、回忆和资料在各种研讨会、刊物、媒体、网站上如井喷般涌现，对其庞杂、丰富的内容作整理、介绍，并对近20年有关文革的研究和发表情况加以梳理、归纳、总结提炼，将有助于对文革的理解与研究。本人不揣冒昧，尝试这一工作，由于水平和资料阅读条件的限制，挂一漏万的情况难免，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可以把进入21世纪前后几年当作文革言说的分水岭和新起点，在文革30周年纪念日，中国大陆、香港、美国、日本等地的文革研究者、经历者、关心者、社会组织、刊物、媒体等发表了大量有关文革的论著、评论、回忆和其他文字。在这之前，关于文革的言说基本上出自西方，而从这时起，中文言说处于主导地位。（1）

利用电子手段搭建文革言论的平台，是1996年之后的新现象、新特点。由《华夏文摘》编辑部于1996年春季提议，网站《网上文革博物馆》于1999年10月正式建立，在此前后，网刊《往事》《记忆》《昨天》等陆续面世，使许许多多文革的研究者、经历者、关心者有了说话的地方和交流的平台，尽管它们还没有形成巨大的传播空间。《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于2002年出版发行，该资料库提供了3000多万字可检索的关于文革的第一手材料，为文革研究者和写作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这20来年，大量有价值的书籍成批地出版，它们不但加深、拓宽了人们对于文革的了解，甚至改变了固有的文革图景。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介入文革很深而且当时握有权势的人物撰写的回忆录，比如所谓“林彪集团干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回忆录，又如“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戚本禹的回忆录，再如当时大名鼎鼎的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自然有自我辩解之词，有意无意地歪曲性叙述，对事情原委的错解释，但它们的价值是无可否定的，它们至少为研究者提供了印证、比

对、分析，从而探索真相的可能。高文谦在2003年出版的《晚年周恩来》对于揭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以及上层权力关系格局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材料。还有群众组织头头（比如黑龙江的范正美，内蒙古的高树华，上海的徐景贤和沈福祥，安徽的梁守福，重庆的李木森，湖北的杨道远和魏绳武，北京的孔丹，等等）的回忆录，文革中进行思想理论探索而受到镇压者（比如湖南的杨曦光，广东的王希哲和刘国凯，湖北的鲁礼安，等等）的回忆录，其中包含的史料之丰富，观察之犀利，反思之深刻，让研究者和后来人感慨不已。

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起，以香港的各家出版社为基地，出版了不少严肃认真或者具有分量的学术研究著作，比如徐友渔的《形形色色的造反》（1999），唐少杰的《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2003），印红标的《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2009），何蜀的《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2010），启之的《内蒙文革实录》（2010），徐海亮的《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2010），等等。

与材料的急剧膨胀和极大丰富相对应，这20年研究的突出特点是话题的多元和观点的分歧，经历文革的一代人大多已届晚年，一吐为快的心情溢于言表，而学术研究的规范和传统尚未形成，因此在各个方面呈现多为自说自话状态。这说明，文革的研究和言说，目前还处于探索成长期。

◇ 地区、部门、学校、事件的文革话题

30年来，以中国各个地区、部门、学校、事件为话题的文章、书籍、回忆录、资料大量涌现，常有令人目不暇接之势。

材料最丰富的要数对于上海文革的回顾和论说。李逊的《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96），她与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合著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上海在文革中》（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stview Press, 1997），李逊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对于上海的文革进程做了深入、全面的分析。何蜀的“文革中所谓的‘上海一月革命’——毛泽东制造的一个‘文革样板’”（《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2月号）、李逊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文革中上海‘工人造反派’及工人阶级的地位”（《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2月号）、王锐的“‘安亭事件’的再认识和再研究”（《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10月31日，第55期）、顾训中的“文革风云人物的再认识——徐景贤个案解读”（《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4月号）对于上海文革运动的性质、事实、群众组织、风云人物都做了新的解读，表现了重新认识文革的努力。基于上海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电子刊物《记忆》在2010年11月15日和2011年12月29日（总第62和79期）作出两期“上海文革专辑”，刊载有关上海文革各方面情况的文章十多篇。还应提及的是，由金光耀、金大陆主编的《上海文革史研究资料汇编》出版了自印本，它包括《复旦大学大字报选（上、下）》《叶昌明工作笔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献汇编》《上海红卫兵大串联史料选》和《复旦大学文革大事记》。

董国强在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和江苏省的文革运动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论文有：“从南京大学‘倒匡’事件看文革的复杂性多重面相”（《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9月30日，第54期），“江苏《一·二六夺权》前后的权力角逐”（《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7年6月30日，第63期）。他采编出版《亲历文革——14位南京大学师生口述历史》（2009），网刊《昨天》在2012年8月30日第8期刊出“董

国强南京文革研究专辑”，其中包括董国强所写的“南京大学文革造反第一波”等3篇文章，他与Andrew G. Walder合写的“南京文化大革命冲突的起源”等4篇文章。该刊还在2012年12月30日第12期发表两人合写的《1974：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另外，董国强还在《记忆》上发表《1967年南京“一·三事件”浅析》（2011年1月30日，总第67期），《南京文革群众运动的起源和派性认同》（2011年7月30日总第73期）。乔晞华的著作《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南外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个案分析》则对南京一起发生在运动初期的具有独特性的事件进行了详细描述和分析。

对某个省区的文革运动有多种论著加以反映或研究的情况还有：内蒙古（除启之的著作外，还有高树华、程铁军合著《内蒙文革风雷》，杨海英的日文和中文著作《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广西（《广西文革档案资料》《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晓明的《广西文革痛史钩沉》，《昨天》于2014年4月30日总第33期刊出广西文革专辑，包括有关文章4篇）；四川（《昨天》于2013年4月30日总第16期、2013年12月30日总第30期、2014年8月30日总第38期刊出四川文革专辑，包括有关文章14篇）；青海（《昨天》于2015年7月30日总第55期、2016年5月30日总第70期刊出青海文革专辑，包括有关文章15篇）；山西（赵瑜著《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石名岗执笔《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昨天》于2013年7月30日总第19期、2013年9月30日总第22期刊出山西文革专辑，包括有关文章10篇）。

文革中，有些大学或中学的运动特别引人注目，这些学校的校友们又有心回顾、反思当年的历史，于是这些学校的文革历程被反映得比较充分。这样的大学有清华大学（除了蒯大富的回忆录，还有对立派头领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孙怒涛的《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唐金鹤的《倒下的英才》，叶志江的《走出文革》，以及孙怒涛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邱心伟、原蜀育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昨天》于2015年4月30日总第50期推出清华文革回忆反思专辑，《记忆》于2010年10月10日总第59期、2010年10月20日总第60期推出清华大学文革专辑，共收材料12篇）；北师大女附中因为有打死校长卞仲耘事件而引起强烈关注和校友的积极反响，成为全国的关注点（《记忆》从2010年4月28日总第47期到2014年1月15日总第106期共6期发表有关材料30余篇）。

关于部门文革运动的书，引起重视和评论的有如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恽仁祥的《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

引起集中关注和讨论的文革重大事件有如“二月镇反”（徐友渔的论文“文化大革命中的‘二月镇反’”，《昨天》2016年5月30日总第69期的“二月镇反”专辑辑录文章10篇）和“七二〇事件”（见《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通讯》从2006年3月20日总第322期到2007年7月18日总第422期上多篇文章，前面提到的徐海亮的《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更是作出了翔实、周密的辨析）。

西方研究者对1967年香港发生的左派造反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中国季刊》上一篇题为“香港1976年暴乱：殖民地总督的外交与内政前线”的文章分析了香港总督戴麟趾、英国驻北京使团、伦敦英国外交部对待香港暴乱态度的微妙差别，以及港督的强硬压制态度如何占据上风，港英当局是如何抓捕左派、取缔左派报纸和关闭左派学校的。（2）类

似而更详尽的描述和分析见论文集《香港五月的日子：1967年的暴乱和突发事件》。
(3)

对农村文革的研究出现了新篇章。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5卷中，作者断言文革基本上没有波及中国农村，徐友渔在书评中提出异议。魏昂德(Andrew Walder)和苏阳根据对1520个县的县志研究再次断定，说文革对农村影响甚微的观点不正确，情况正好相反。作者粗略统计，中国农村在1968—1971年期间死亡人数在75万至150万之间，造成终身残疾者的人数与此相近，遭受政治迫害这人数为360万。(4)陈意新在探讨农村造反运动的原因时，通过对两个农村点的梳理，把源头追溯到四清运动。作者的结论是：四清运动是理解农村文革造反运动的关键。(5)

文革研究的重点转向对于各个地区、部门、学校、事件的更具体、更详细的研究，表明文革研究的深入和扩大。以前的叙述和研究集中在最上层的决策和权斗，以及个人回忆和对于个人遭遇的描述，而缺少对于“中间层”的了解，其实，“中间层”的情况是内容最为丰富的。对文革的全方位研究势必要发展到重点关注“中间层”。

◇ 对暴力、武斗、迫害、屠杀的聚焦

文化大革命与其名称相反，不是一场有关文化的革命，而是充满了暴力、武斗、迫害和屠杀，但在有关文革的叙述和研究中，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反映了这一点，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对此特点的意义也没有深入发掘。

王友琴在2000年10月创立网站《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2004年出版《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她尖锐指出：“千万普通人被迫害致死，才是文革景观的中心。”她孤军奋斗和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得暴力和迫害问题进入人们视野的中心。

王友琴还记载和分析了北京大学文革期间由于暴力迫害造成的死亡，她指出，虽然63人多数死于自杀，但真实的原因是他们死亡之前受到的各种残酷殴打和虐待。(6)唐少杰则分析了清华大学非正常死亡中自杀居多意味着什么。(7)张晨晨在分析文革初期的暴力时强调文革与之前17年之间的连续性，1966年夏天的暴力主要是单向性的、具有仪式性的、并不着眼于权力争夺的身体迫害。(8)至于北京其他单位和全国其他地方的非正常死亡，在《昨天》的2013年11月30日总第25期、2016年6月30日总第72期的非正常死亡专辑中有进一步的反映。文革中的武斗是造成大量伤亡的原因，也构成了所谓“文化”革命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方面的叙述、讨论和分析相当多，文革中重庆的武斗十分突出，《昨天》的2014年6月30日总第35期和36期(增刊)、2015年9月30日总第57期刊登3期重庆武斗专辑文章11篇。而该刊在其2014年3月30日总第31期的武斗专辑第2集中则集中描述了虐杀俘虏的事件，另一武斗专辑是在2012年3月31日总第3期，上面有关于武斗的文章11篇。

宋永毅在《文革大屠杀》的前言中指出，文革中的大屠杀是“中共的国家机器行为”。徐友渔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在并非外族入侵的情况下，一国之内在十年之间发生了多起大屠杀，这是民族的耻辱；而国民对此麻木不仁甚至熟视无睹，这是另一重耻辱；对这耻辱不敢直面而是刻意遮掩和曲意辩解，则是再一重耻辱。”

《当代中国研究》在10余年的时间内发表了多篇关于暴力与屠杀的论文：宋永毅的“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吴迪的“1967年内蒙古‘造反派’与内蒙古军区的冲突—

“文革中军队向学生开的第一枪”（2002年第3期），苏阳的“文革中的集体屠杀：三省研究”（2006年第3期），林启山的“文革时期湖南省邵阳县‘杀黑风’事件始末”（2009年第3期），申晓云的“文革中枪杆子里面出革委会——广西‘武斗’真相”（2013年第1期）。

关于文革中的暴力、武斗、迫害和屠杀，最有分量的两本书非谭合成的《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和明镜出版社出版的史料《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莫属，这是两部篇幅巨大、内容沉重的书。《血的神话》详细描述了那场发生于1967年秋季，造成道县一县死亡4519人，所在地区非正常死亡9093人，15000多人直接或间接参与杀人的大悲剧。丁东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说，1967年的道县事件，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下，以阶级斗争名义进行的大屠杀。《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原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当局编撰的官方内部档案资料，详细记载了广西文革，特别是其中发生大屠杀的全过程，包括人吃人的骇人听闻的惨剧。宋永毅在此书的序言中指出，这一机密档案的出版将给文革研究带来不少新课题和新挑战。确实，广西的杀人和吃人风潮无可置疑地揭示了文革中长期不为人知，至今还有不少人不愿意承认的极端违反人性的一面，它们将使任何美化文革的说辞不攻自破。

在《二十一世纪》2016年6月号总第155期的“文革五十周年专辑”中，有两篇文章讨论上述话题，一篇是宋永毅的“广西文革中的吃人狂潮”，另一篇是严飞的“政治运动中的集体暴力：‘非正常死亡’再回顾（1966—1976）”。

◇ 对文革的总体评价

对于众多的文革研究者来说，萦怀于心的大问题是要对它做出一个总体评价，包括回答这样的问题：文革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政治运动，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文革如何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它给中国留下了什么遗产？当时间正是逢十的周年纪念日，对这类问题的兴趣和热情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文革发动40周年的2006年，“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于3月24—26日举行，与会者讨论了关于文革评价标准问题，丁东在题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尺度”的发言中说，在国内，评价尺度的变化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毛泽东的尺度为标准，代表性的文件是中共九大、十大政治报告，颂扬文革；第二个阶段是以邓小平的尺度为标准，代表性的文件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看法是批评和谴责文革，经过几十年的探索，有一些学者跳出体制，开始以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为价值准绳，从反思极权主义的思路出发，对文革有既不同于毛泽东，也不同于邓小平的理解。（9）

《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总第93期做了一期“文革四十周年”专辑，艾恺（Guy Alitto）在“文革：四十年后的破晓”中自问自答：“再过一百年，历史学家将如何铭记和解释文化大革命呢？我的论点是，毛泽东理想的本质是反现代主义（更具体地说，是反现代化）。文革将首先作为二十世纪最突出的‘反现代化’现象而被人们所铭记。”在回答文革是权力斗争还是理想的冲突这个问题时，他说：“再过一百年，人们在研究文革时也许不会那么看重权力斗争的一面，而会把文革中体现出来的毛主义的理想蓝图看成是最主要的。”（10）

法国社会学家杜兰（Alain Touraine）在回答“能否将文革视为一场社会运动”时回答说：“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将其界定为‘反社会运动’，即它与社会运动背道而

驰。”“第一，文化革命不是从基层发起的运动，它主要是由毛发动的；第二，文革模式不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所谓‘炮打司令部’，即是说号召全体人民起来铲除那些需要被铲除的人，那么这就只是战争模式、矛盾对抗模式，而不是社会冲突的模式；第三，文革运动已经没有共同的认同，因为它是文化价值层面的运动。”〔11〕

白霖（Lynn White III）在文革30周年时指出，对于文革的实质和起源存在争论，结论取决于对文革的定义，他认为文革最重要的特征是大规模并且持久的政治强制（包括暴力）。文革的发生与其归结为思想意识，不如归结为社会形势；关于文革发生的原因，与其追究领导人个人，不如追究社会集团；文革起因既不是短期的，也不是长期的，而是中期的。〔12〕

谈到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描述、总体评价、发生原因分析以及责任追究等问题时，我们必须提到关于文革的三部鸿篇巨制，以下简要介绍它们的文革观。

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一书中认为，文革发动的外部原因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的反对斯大林、与西方世界和平共处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内部原因则是毛泽东对于形势的估计，他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迫在眉睫，因此他要发动一场政治运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尤其是在高层掌握权力的领导人。

杨继绳在《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中主张，文化大革命前的制度是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社会中已经产生了一个新阶级，一个庞大的、追求私利的官僚集团，毛泽东以天下大乱的方式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他在运动初期鼓励造反派冲击官僚，在运动后期为了恢复秩序又支持官僚遏制造反派。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和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而最终的胜利者是官僚，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

冯克（Frank Dikotter）在《文化大革命：人民的历史1962—1976》（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People's History, 1962—1976）中从社会层面这样描述文革：不论是平民还是精英，许多人在运动初期因为被揭发和恐惧而自杀；在个人崇拜的风气中，各地、各单位掀起制造毛主席像章的狂潮，与此同时，牟利的动机普遍存在，黑市交易火热；从1967年底起，置身于运动之外的“逍遥派”发展壮大，他们热衷于听音乐、看小说、旅游，黑社会和犯罪团伙在城市蓬勃发展；文革中政策朝令夕改，使得农民的自发生产活动有可能回归市场，在有些地区，自留地、种植经济作物、集市贸易都非常活跃，计划经济和公社化管理形同虚设。

◇ 重新审视林彪事件

林彪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出人意料的事件，同时也是意义最深远的事件。林彪事件刚一发生，中共中央就为这一事件的性质、起因、情节等提出了一整套说法。这些说法不合情理，难于令人信服。早在1993年，作者之一为吴法宪女儿的一篇题为“林彪事件：20多年之后”的文章就对官方的说法提出强烈挑战，并考虑事情另外可能的真相。〔13〕接着，这位作者又出版专著，以对林彪事件当事人的大量采访和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情况的熟稔为基础重新解释林彪事件。她的主要论点和林彪女儿的观点一致：针对毛泽东的活动不应该由林彪负责，主要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干的。〔14〕

林彪事件本身属于宫闱政治，异常诡秘，要还原事件真相很不容易。但在林彪事件发生30多年之后，研究者们还是纷纷质疑官方旧说，提出自己的新见解。

毛泽东指控说，林彪及其追随者提出设国家主席，这是他们的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王年一、何蜀对此表示不认同。二位作者缕述了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党内高层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指出不只是林彪，而且是大多数人都主张设国家主席，林彪没有当国家主席的意图，毛散布说林想当国家主席缺乏事实根据。毛打倒林彪，不是林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而是另有原因。（15）

针对官方把林彪“九一三”出逃事件定性为“抢班夺权、叛党叛国、仓皇出逃”，王年一、何蜀、陈昭著文认为，林彪外逃事件是被毛泽东逼出来的。作者认为，根本问题在于，九大之后，毛泽东认为林彪地位迅速上升，有“羽翼丰满、尾大不掉”之势，习惯于大权独揽的他感到惴惴不安，他采取以下方法逼迫林彪：明批陈伯达，实指林彪；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毛所谓的“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以削弱林彪的军事指挥权；以敲打黄永胜等人的手法剑指林彪，逼林认罪；最后，南巡“打招呼”，公开去林意图。（16）

对于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质疑和争论的声音更多，涉及的问题有：林彪是否有谋害毛泽东的阴谋，林彪是否有武装政变的阴谋，所谓“九八手令”是否真的出自林彪，林彪是否真有“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的打算，林彪是否企图外逃苏联，等等。许多论者认为，官方给出的说法破绽百出、自相矛盾，不能令人信服。（17）

《记忆》从2011年3月30日总第74期到2011年11月30日总第78期推出“九一三”专辑或专论“九一三”事件的文章，5期共刊出文章近40篇，除了学者的研究性论文，还包括“林彪集团”成员及其子女的文章、对话，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回忆“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的情况与感受。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林彪事件在广大人群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和怀疑，人们对于官方的解释并不相信，文革路线由此而走向破产。

已故著名史家高华对于林彪部属及其子女和一些论者同情或正面评价林彪的主张提出异议，他认为，林彪从深居简出状态出山强力支持文革，既有毛泽东拉的一面，也有他的权力野心的一面；林彪及其集团在文革中并非一味消极应付，而是利用时机大力追求政治权力的扩张，兴风作浪之事不少；在林彪及其集团的权力膨胀对毛泽东的绝对垄断权力形成妨碍和威胁时，毛林的矛盾开始发展加剧，并以林彪和妻儿的悲剧性死亡结束。他认为，评价林彪事件应考察体制因素，以及这个事件所反映的1950年代之后国家发展方向等问题。（18）

21世纪以来，关于林彪事件的书籍大量涌现，比如丁凯文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2004），舒云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2006），吴润生的《林彪与文化大革命》（2006），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2012），启之、何蜀编《温都尔汗的幽灵：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周年后的回忆与思考》（2012），余汝信编《“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2013），等等。当然，这些书的价值和真实性是参差不齐的。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革中涉及千家万户的大事，但中国人的有关研究却起步很晚，在20世纪80年代，还只见有关知青的文艺作品。与之相对照，西方学者的重视程度要高很多，人们至少可以见到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Thomas P. Bernstein）发表于70年

代的学术专著《上山下乡：中国青年从城市到乡下的迁移》（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此书于1993年以《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为名翻译出版，在中国仍然是知青研究的先声。

进入1990年代之后，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文字骤然涌现，有分量的研究性著作也不断问世：刘小萌、定宜庄、史为民、何岚著《中国知青事典》在1995年出版，定宜庄著《中国知青史——初澜》，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史——大潮》在1998年出版。在2009年，有关知青研究的大部头著作的出版呈现大面积丰收之势：潘鸣啸著《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繁体字版，法文原文版2004年，大陆简体字版2010年，英文版2013年），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顾洪章主编《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始末》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在10年之后经修订再版。以上著作，有的全方位地呈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过程，全面分析了运动的起因、问题、结束、后果，并与文革前的知青下乡动员、苏联的类似运动作了对比，有的收入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至2009年这三个时期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代表性论述，有的披露了官方的有关决策过程和原始资料，总之，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经过10多年的努力，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研究形成了高潮。

在关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中，引起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发动运动的原因何在？伯恩斯坦夫人在《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前言中用第三世界国家城市人口膨胀和失业来加以解释，潘鸣啸认为仅仅经济解释是不够的，他认为还有意识形态原因（再教育和缩小“三大差别”）和政治原因（降伏红卫兵，恢复社会秩序）。从伯恩斯坦发表的对《失落的一代》的书评看，他同意并赞扬潘鸣啸的观点。（19）

《二十一世纪》2013年4月号做了一个“知青与当代中国”的专题，回应中共18大后“知青从政”的广泛议论。潘鸣啸在“‘文革一代’上台执政：差异何在？”中指出，与利益相比，代际因素的分量并不是很重，18大登上最高位置的中共领导人并不是典型的知青一代，由于自身经历，他们会有新的领导风格，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突破与创新。徐友渔在“上山下乡对知青一代思想形成的影响”中说明，下乡后目睹农村贫穷落后的现状，耳闻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灾难和后果，使知青告别了以前的意识形态和革命化教育，但对中国现实的了解并不意味着拥抱人类政治文明，那还需要有对于世界大势与潮流的把握。丁东在“知青经历和一代人的价值取向”中从具有底层经验、深知农民疾苦、习惯毛式语言、时露江湖习气等方面分析了具有知青经历的从政者的精神特质，并指出，知青时代的遗产中包含某些与现代文明相悖的因素需要认真清理而不是盲目赞美。

《昨天》2015年5月30日总第51期是知青专辑，发表文章9篇，其中马昌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逆历史潮流的反现代化运动”指出，将大批知识青年送往农村，走的是一条与加速城市化进程的世界潮流相反的道路，在强制性政治动员之下，知青的基本人权（温饱权、受教育权、择业权、选择居住地权、满足文化娱乐精神需求权）被剥夺或践踏；知青下乡实际上是与农民争地争粮，并把城市文革中搞阶级斗争和极左的做法带到农村；许多知青在身体健康、家庭婚姻生活等方面造成终生无法弥补的创伤。

《记忆》在2015年12月31日总第146期推出知青专辑，发文章5篇，在2016年12月15日总第177期推出上山下乡专辑，发文章4篇。其中任国庆在“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年祭——民族灵魂之管窥”中得出结论说，把上山下乡运动放到人类文明发展的视野来观察，它是反文明运动；放到人性立场去考量，它是反人性的运动；放到法律层面去考量，它是一次政府犯法行为。也有人论及知青下乡的正面作用，在一篇题为“在毛主义的

中国下乡知青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文章中，作者论述了知青下乡后对当地经济、技术、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不仅是知青带去了文化和技术，更重要的是派出知青的大城市、知青们有权力、有资源的父母和亲戚为了改善他们的处境和地位而给予知青接受地的巨大支援，这包括物资、技术、资金、培训各个方面。（20）

潘鸣啸在“中国知青‘失落一代’受限的、扭曲的然而鲜活的记忆”中详尽分析了上山下乡知青在时隔几十年之后的集体记忆，这代人顽强地想要表达记忆的努力和官方竭力控制、扼杀记忆的压制行动形成对抗和拉锯战，作者认为，对苦难岁月的记忆有可能导致赔偿的要求和对执政合法性的动摇。（21）

◇ 文革中的异端思潮和一代人的思想转向

文化大革命虽然是思想高度统一，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但运动开展不久很快就出现了与官方意识形态和文革指导思想不一致的主张和理论，这是年轻的文革参与者自主思考的结果；而在学生退下政治舞台的前后，经历文革的一代人中开始出现了怀疑、反思、批判、反对文革的倾向。对异端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内容的描述与分析，对一代人政治态度转变的原因和过程的剖析，是近20年文革研究的一个重大主题。

宋永毅早在1996年《二十一世纪》8月号上就发表“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他介绍了遇罗克在《出身论》，李一哲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中追求人权、平等和民主的思想，还介绍了湖南“省无联”、湖北“北、决、扬”，上海“中串会”等组织的激进思潮，以及文革中其他有影响的非官方思潮。次年，宋永毅和孙大进编辑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出版，该书收罗了文革中出现的主要异端思潮的原始资料，并在“总论”中阐明了异端思潮产生的背景和条件，各种异端思潮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诉求，并指出读书运动和社会考察在促进异端思潮成熟时所起的作用。

徐友渔在发表于1996年《二十一世纪》10月号上的“异端思潮和红卫兵的思想转向”一文和《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中指出，经历文革的年轻一代政治立场和思想的根本转变发生于文革期间，而不是文革结束之后，更不是有人到西方留学之后，思想转向的原因是：一、文革政治的无原则、阴暗、残忍令人反感；二、被迫上山下乡看到的贫穷、落后的现实使“制度优越性”的教条破灭；三、林彪事件对旧信念的巨大的破坏性作用；四、广泛的地下读书运动和异端思想对同代人的影响。

宋永毅在《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4期上发表“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派——文革中青年一代觉醒的心路历程的本质与毛泽东的集权思想”，他指出，最先使青年人产生异端思想的，恰恰是毛泽东本人在文革初期的一些政治操作，比如对于巴黎公社原则的推崇，提倡独立思考，打出人权牌和民主牌等等，而1970年代的地下读书运动使异端思想的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印红标在《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中对于文革中青年一代的民间思潮、怀疑思潮、反叛思潮等作了全面、细致的描述和梳理。

不少人对于文革中的读书活动，对于思想探索和思想立场的转变作了具体、生动、精彩的回忆和记叙，下面是随手从网站上摘录的例子。

文贯中（上海市徐汇中学高三年级）：“无辜的反动学生难忘的农村岁月”（华夏文摘增刊，第二四八期）；阿城：“听敌台”（华夏文摘增刊，第五四八期）；葛岩（西安第七

十一中学)：“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华夏文摘增刊，第五五七期)；奚学瑶(北大学生)：“青春非常之旅——我的文革印迹”(华夏文摘增刊，第六七四期)；千山暮(安徽芜湖第一中学，高三，19岁)：“关于文革的一次口述史访谈”(华夏文摘增刊，第七六六期)；唐燕：“当年贫下中农是这样‘再教育’我们的”(华夏文摘增刊，第八七三期)；阎淮(清华学生)：“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与反思(下)”(华夏文摘增刊，第九九二期)；叶文宪(安徽，高二)：“插队散记”(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网站，<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566>)；吴明明：“插队记零”(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网站，<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1123>)。

杨国斌的《中国的红卫兵一代和政治积极性》是研究异端思潮、下乡经历、地下读书运动，一代人思想转向和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新著，他在书中把下乡经历描述为对于红卫兵一代人是一个去神圣化、常规化、肯定日常生活价值的过程，使得这一代人的激进主义减弱，并在后来成为改革政策的社会基础。(22)

◇ 文革的社会生活史视角

从地域文化和社会生活史视角研究文革，是近年来文革研究的一个特点。研究者刚开始是不得已采纳这种方式，然后逐渐感受到其好处，最后认为这是正确的和值得提倡的方向和方法。这种视角的提倡者和践行者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2011年7月3日，文革电子刊物《记忆》编辑部对他进行了采访(见2011年12月30日，总第79期)。他说，在当前的形势下，由于政治上的不方便和高层档案不开放，谈论政治人物、政治事件，做政治史、运动史的难度很大，在“难有实质性突破的情况下，倡导各地学者进入文革区域史研究，不仅存在可能性和可行性，甚至是相当正确的路径。”

金大陆的著作《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于2011出版，内容涉及人口、婚姻、计划生育、接待外地红卫兵和上海红卫兵外出串联、服饰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记忆》编辑认为，该书不但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文革研究的新思路。其实，作者的这种研究路向早在发表于《二十一世纪》2006年6月号上的文章“上海文革时期毛泽东像章的流通和生产”中就显露端倪。他发现，文革期间毛泽东像章的功能除了表征对领袖的爱戴与效忠，还具有收藏、交换功能，成为在黑市上投机的紧俏商品。

几乎同时，徐贲在《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3期上发表“文革时期的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揭示了文革期间物品的夸示性、表演性联想和仪式化消费行为的现象，并指出，那种认为文革中物品分配是按照公正和平等原则进行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董国强也倡导在精英和上层政治研究之外开辟“由社会史视角切入(同时带有显著的地方史研究特色)的群众运动研究。这种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一般社会公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反应和抉择，以及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对地方政治发展、经济建设、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实际影响。”他在“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2期)和“派性身份、个人处境与政治抉择：从地方视角反思文化大革命”(宋永毅主编：《文革五十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明镜出版社，2016年)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在这种视角下取得的研究成果见之于他与Andrew Walder合写的一系列论文。

《记忆》在2009年4月14日总第20期推出“文革婚恋专辑”，包括5篇文章，涉及工人、农民、知青、大学生、黑五类、知识分子等不同的社会阶层，其目的也是对文革研究的拓宽视野、变换角度能有所帮助和启发。

《昨天》在2014年10月30日总第41期推出“文革民生专辑”8篇文章，从各个方面描述了文革期间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在2017年1月30日总第84期推出“农村文革专辑”，选登有关农村生活文章4篇。徐海亮在“社会视野下的初期武汉文革”（载于《文革五十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中从社会史角度重新审视武汉文革的“50天”，分析既往社会历史与政治文化在文革中的投影，诉说造反骨干在现实生活中的疑惑，剖析家庭出身、党员身份等传统思维对造反工人行为的影响，力图以社会学的眼光来解说文革前的社会分化如何发展为文革中的社会对立。

孙沛东在“衣领革命：文革中在广东作为抵抗的日常服饰”一文中认为，至今文革研究的主流还是关心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很少谈及日常生活，她根据文革亲历者的口述和照片研究文革中的服饰时尚，她指出，尽管人们一般认为那时单调划一，禁欲主义盛行，但其实日常服饰还是一种有意无意地抵抗与表现手段，表达了人们对于多样性、个性化、性别特征与区域融合的追求。（23）

性问题也得到关注和研究，一篇题为“社会主义的性：回头看文革”的论文在考察了文革中各个社会群体的性观念和性经验之后得出结论说：“人们一般认为经济改革之后特有的（或在1949年之前才有的）现象——婚前性行为、婚外情、色情文学、强奸、卖淫、弃婴——事实上在文革中也存在，尽管其原因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24）

有学者在支持从社会生活史角度研究文革之余，也对这种研究中出现的琐屑化、碎片化倾向表示担心。

◇ 文革对世界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不但在国内搞得轰轰烈烈，而且对邻国和世界上一些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那里的骚乱和社会动荡。近20年来，论述文革在国外的反响和冲击的文章不断见之于学术刊物。

《二十一世纪》在1996年的8月号和10月号连续两期推出“文革对世界的冲击”专论，包括7篇论文。其中，日本学者桥爪大三郎在其论文“红卫兵与‘全共斗’——兼谈60年代日本的新左翼”中总结说，中国文革中的红卫兵与日本新左翼和“全共斗”之间有如下的共同点：一、两者都以美苏冷战结构为前提，对苏联的作用表示异议；二、与第一点相比，反美因素相对弱化；三、两者都仅仅是基于群众造反的运动。这里，“全共斗”是日本大学生造反组织“××大学全校共斗会议”的简称。法国著名学者高达乐（Claude Cadart）在“法式毛主义的类别与兴衰1966—1979”中提出，法国毛派知识分子大体有这么几类：沙龙式花花公子和富家子弟的毛主义、学院教授专家式的毛主义、思想大师的毛主义、新闻记者和信息操纵者的毛主义。他还认为，二战之后，法国左派和极左派知识分子的两大罪过是，先是向斯大林主义倾倒，然后又拜倒于毛主义权威之下。

程映虹发表了多篇论述文革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和冲击的论文，在“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3期》）中，他指出，中共在文革期间执行了一条输出革命的路线，向他国大力宣传文革和毛泽东思想，在东南亚地区发动武装革命，在拉丁美洲国家发动和支持游击战，训练非洲的叛乱分子，在全世界煽动革命，全面出击、四处受敌，在国际上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在“毛主义和文革与新加坡左翼运动的关系”（《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1期》）中，他详细描述了左派组织“新加

坡社会主义阵线”亦步亦趋地追随中国文化大革命，放弃议会斗争形式，大搞街头运动和群众斗争，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大搞内部攻击和分裂，终于被历史淘汰的过程。

费明在“金马伦的‘红色’往事——我所知道的‘马共’和大马华侨”（《记忆》2011年10月21日总第77期）中说，马来亚共产党在文革前就已经存在，但不成气候，文革开始后，马共像注射了兴奋剂，无论是组织形式、革命手段、宣传口号，都和以往大有不同，马共游击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大力开展武装斗争，把整个金马伦变成了大马的井冈山，并从山区向平原和城市渗透。当然，文革结束，形势变化，马共游击队最终下山投降。

◇ 文革50周年的纪念与反思

□2016年适逢文化大革命发动50周年、结束40周年，除了中国大陆地区，世界各地的大学、研究机构、社会团体、媒体和刊物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举办活动、出版书籍和发表专辑，纪念和反思文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2016年4月22—24日，题为“纪念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地方文革史新视角”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德国科隆大学举行，来自德国、瑞典、法国、奥地利、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大陆和香港等地的30多位学者参加会议，瑞典文革研究专家沈迈克在会上做“国际上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2016年夏季的形势”的主题讲演。

2016年5月14日，由天问联合学会主办，世界华语出版社、九一三研究会协办，在美国纽约举行“文革五十周年（1966—2016）北美研讨会暨新书发布会”，两部关于文革的新书一部是《红祸》学术论文集，另一部是《红墙》纪实文集。此前一天，由天问联合学会主办，纽约当代中国艺术家协会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协办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文革：文革50年反思图片展”在纽约开幕，5月21日，“文革50年反思图片展专题研讨会”举行。图片展的成功使得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有关机构发出邀请，在该国再次展出。

2016年6月24—26日，主题为“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的学术研讨会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举行，这是一个大型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70多位学者，会议论文集《文革五十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上、下卷）在2016年年底出版。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组织了一整套纪念活动：从9月到11月，举办一场为期两月的文革文物展，题目为“文化大革命：宣传艺术和历史记忆”。在9月22日的开幕式上，放映电影《中国—红色之子：1968年文革期间的中国内幕》，这是一部珍稀的纪录片，为澳大利亚影片制作者Roger Whittaker在1968年旅华期间拍摄。接着，由杨国斌教授做题为“从事文革：忠诚、暴力与异见”的讲演。

2016年10月28—29日，美国杜克大学举办题为“在亚洲和亚洲之外的文化革命”，会议集中讨论了文革在中国、泰国、印度、南亚、秘鲁和发达工业国家的影响，会议上展出了与文革有关的文物，与会者还参加了中国大陆独立制片人吴文光拍摄的纪录片《调查父亲》在美国的首映式。据会议报道，当杜克大学教授连曦在报告中讲到林昭和朗读她写的血书时，会议的气氛到达了高潮。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受文革的影响很大，日本知识界对于文革的研究和反思态度积极。2016年10月16日，日本明治大学举办“文化大革命发动5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上发言的有日本学者石井知章、矢吹晋、土屋昌明、铃木贤，中国学者徐友渔、宋永毅等。

2016年12月2日，日本东京学习院女子大学、静冈大学主办题为“文革五十周年——新资料、新方法”的研讨会，与会者60多人，来自日本、中国、美国、台湾等地。会议组织者杨海英编《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大革命——大屠杀蒙古人基础资料》共9册到2016年出齐，他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在边疆和国际社会》也在2016年出版。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在2016年12月10日举办题为“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传统文化的定位”的研讨会；日本专修大学在2016年12月11日举办文革研讨会，会议缘起是该校教授土屋昌明和“中国六〇年代和世界”研究会主编的论文集《重新思考文化大革命》在2016年11月30日出版，该校邀请作者就该书未涉及的话题进行讨论，中国北京大学教授印红标应邀参加了两个会议并作了发言。

2016年12月7—9日，由法国洛林大学等机构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在梅斯召开，会议名称是“中法交叉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后续”，中国文革网刊《记忆》参与了合作办会，中国学者3人出席该会。

《当代中国研究》在2016年第2期发表“文化大革命发动五十周年纪念特刊”，选登了马若德（即麦克法夸尔）、李洪林、宋永毅等12位作者的论文。特刊编委会强调研究、反思、批判文革的现实意义，因为，“直到今天，无论是官方意识形态，还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都可以看到文革的影响。”

《中国季刊》2016年9月号实际上是一期纪念文革50周年的专号，这期除了书评之外，12篇论文全部谈文革。马若德在前言中写道，中国患了遗忘症，他引证桑塔亚那的著名格言：“那些不能记住过去的人是会重复过去的”，遗忘文革将使文革回复，从未疯狂的人将变得疯狂，从未受压迫的人将受到压迫或者压迫别人。Chris Berry, Patricia Thornton、孙沛东3位作者在其合写的导论“文革：50年的记忆与遗产”中说，打通两个30年的说法以及在公共言论空间和学术研究领域的限制极大地妨碍了对于毛泽东晚期和文革中重大事件的反思。魏昂德在“中国历史的曲折路径：文革的悖论性遗产”（Bending the Arc of Chinese Histor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 Paradoxical Legacy）中认为，文革产生了其发动者未曾料到的后果，即创造了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条件：它削弱了抵制改革的官僚的力量，它导致经济濒临崩溃，国家贫穷落后，使得改革显得十分紧迫，为了反制苏联而采取倒向美国的战略，对比中苏改革历程和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作为，情况一目了然。魏格林（Weigelin-Schwiedrzik）等3位作者在“谁之罪：文革50周年前的记忆和政治”一文从政治学和记忆研究的角度分析了宋彬彬道歉事件的背景、后果与含义，认为关于文革的记忆仍然是文革中对立群体的战场，老红卫兵力图把自己和父辈说成是文革的受害者，而追随毛的前造反派力图改变党的否定文革的决议，用文革的目标来对比当今不公正的现实。

2017年1月8日，题为“以史为鉴：中外学者论文革”的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美国、法国的文革研究者在大会上发言，会议对公众开放，到会人数甚众，讨论气氛热烈。

注释：

- 1, 参见徐友渔:《文革研究之一瞥:历史、现状和方法》,载于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页6—8。
- 2, Ray Yep, “The 1967 Riots in Hong Kong: The Diplomatic and Domestic Fronts of the Colonial Governor”, *The China Quarterly*, Mar. 2008, pp122-139.
- 3, Robert Bickers and Ray Yep (ed), *May Days in Hong Kong: Riot and Emergency in 1967*,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 4, Andrew Walder and Su Ya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Scope, timing and human impact”, *The China Quarterly*, Mar. 2003, pp74-99.
- 5, 陈意新:《文革初期农村的造反运动——安徽老瞿村和定远县的案例》,《二十一世纪》,2016年8月号,页61—77。
- 6, 王友琴:《六十三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页42—55。
- 7, 唐少杰:《清华大学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同上,页56—64。
- 8, 张晨晨:《文革初期的集体暴力》,《二十一世纪》,2008年12月号,页52—61。
- 9, 郝建编:《文革四十年祭—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全记录》,美国:溪流出版社,2006,页62—64。
- 10, 艾恺:《文革:四十年后的破晓》,《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页4、5。
- 11, 杜兰:《文革是一场反社会运动》,《二十一世纪》,1996年8月号,页28、29。
- 12, 白霖:《对中国文革的解释》,《当代中国研究》,1996年第2期,页149—151。
- 13, 见 Stephen Uhalley Jr, Jin Qiu, “The Lin Biao incident: More than twenty years later”, *Pacific Affairs*, Fall 1993, pp386-398.
- 14, 参见 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e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5, 王年一、何蜀:《1970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在“设国家主席”之争的背后》,《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春季号,页137—152。
- 16, 王年一、何蜀、陈昭:《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夏季号,页137—154。
- 17, 参见丁凯文:《“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评》,《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夏季号,页141—159。
- 18, 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页69—87。
- 19, Thomas Bernstein, “Book Review: *The Lost Generation: The Rustication of China's Educated Youth (1968-1980)*”, *The China Quarterly*, Jun. 2014, pp574-576.
- 20, Michel Bonnin, “Restricted, Distorted but Alive: The Memory of the ‘Lost Generation’ of Chinese Educated Youth”, *The China Quarterly*, Sep. 2016, pp752-772.
- 21, Michel Bonnin, “Restricted, Distorted but Alive: The Memory of the ‘Lost Generation’ of Chinese Educated Youth”, *The China Quarterly*, Sep. 2016, pp752-772.
- 22, Guobin Yang,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16, p16, p114.

23, Sun Peidong, "The Collar Revolution: Everyday Clothing in Guangdong as Resistance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Sep. 2016, pp773-795.

24, Emily Honig, "Socialist Sex: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visited", Modern China, Vol. 29, No. 2, 2003, p171.

□ 来源：《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一）》启之主编，2019年11月

~~~~~

## 【往事非烟】

### 我所知道的“一打三反”运动

• 吴乃龙 •

1970年3月我从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陕西省商南县。到商南县革委会安置办公室报到后，我们被县革委会“借用”，到商南县公安机关军管组帮忙搞“一打三反”专案。

“一打三反”的全称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发动这个运动的根据是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

这个运动是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1966年6月开始，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造反派和红卫兵气势已尽。各级“红色政权”即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和巩固，对一些重要部门实行军事管制。当局也就是当权派终于腾出手来镇压社会上的反对力量或疑似反对力量，扫荡一切民间的异议思想。说是“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即打击反革命，也就是镇压政治犯、思想犯。其残酷和血腥，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不相上下。要否定文化革命，必须否定“一打三反”运动。

根据“历代商南大事记”，商南县的“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于1970年3月，结束于1971年3月，历时一年。运动中全县揪出“九种人”746名，有2719名农村基层干部受到触及。被定为历史反革命5人，现行反革命10人，运动中发生自杀事件41起，死亡28人。“大事记”还说，1971年6月，县革委会对“一打三反”运动揭发出来的人和事进行落实政策，对195人进行定案处理。其中：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133人，按敌我矛盾处理62人，补订地主、富农78户。（“九种人”即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资本家、坏分子、右派分子。）

以上对商南县“一打三反”运动的叙述，是避重就轻、轻描淡写。只提及“九种人”、“农村基层干部”，只用“揪出”、“触及”这种含糊的字眼；只提及“自杀”、“死亡”。即使如此，也可见运动打击面之广。商南是个山区小县。1970年的人口大约是16万，估计成年人大约9万。“揪出”大约百分之二的成年人，“触及”大约百分之三的成年人。“大事记”最刺眼的是最后的光明尾巴：“落实政策”。上级制定的政策总是正确的，只是下级执行时出了偏差。这是最虚伪的说词。这个《1984》式的“新话”，从文化革命开始，至今还在使用。1970年3月至8月，我在商南县公安机关军管组帮忙搞“一打三反”专案。据我所知，运动中许多人被随意逮捕、判刑，甚至被处决。这是“历代商南大事记”刻意回避的事实。

#### 一、运动特征

概括起来，这个“一打三反”运动有如下特征：

### 1.由县军管组主导

商南县军管组的全称是“商南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组”。“公安机关”是对原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统称。这个三合一的县军管组负责立案，办案，定案，处置。没有检察院的起诉，没有法院的审判，公安局包办一切。县军管组的负责人是个现役军人、连级干部韩学军。大家叫他老韩。老韩是个三、四十岁的大老粗，至多有初中文化水平，连文件都念不通顺，根本没有法律知识。军管组有临时抽调的几十人，杂七杂八，原来干什么的都有，只要是被认为政治上可靠、有一点文化就行。

### 2.群众运动（运动群众）

运动期间，生产大队就可以抓人，押送到人民公社。只要公社革委会同意，就可以押送到县军管组，投入县看守所，关押起来。所以，看守所人满为患。是谁赋予生产大队、人民公社这种抓人、押送人到县军管组的权力？只能是县军管组。与其说是群众运动，不如说是运动群众。

### 3.宁左勿右，宁重勿轻

在立案、办案、定案、处置过程中，宁左勿右，宁重勿轻，以扩大运动成果。杀人越多，判刑的人越重越多，抓捕的人越多，成果就越大。

### 4.草菅人命

宁左勿右、宁重勿轻的极端就是草菅人命。中央文件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到了后来，听说中央要收回杀人批准权。县军管组的人说，得赶快杀，不然就来不及了。

立案、办案、定案这个流程的最后步骤是县革委会常委会讨论，结果上报陕西省。“三结合”（即“军、干、群”结合）的县革委会常委会由军人即县武装部部长、政委，被解放的干部，以及群众代表组成，大致上总人数15，各方占三分之一。定案讨论的情况大体如下：县军管组办案人员汇报案情；“军”方首先唱高调，提议定重罪；“干”方温和一些，在肯定“军”方意见的基础上减轻一点；“群”方则没有自己独立的看法，只是表示同意。如果“军”方坚持己见，则无人敢不同意。最后，众人附和，得出最后的结果。

## 二、我所知道的案件

下面是我知道而且现在记得的一些案件，发生时间仅限于1970年3月至8月我在商南县军管组帮忙搞专案期间。

### 1.最血腥的案件

到县军管组不久，我们被安排参观设在县革委会的“商洛地区‘一打三反’运动成果展览”。“刘总师反革命暴乱集团”是展览的特大案件。这个“刘总师”案发生在商洛地区的镇安县以及相邻的安康地区安康、旬阳县。本来，文化革命中这些地区有一个群众组织叫做



“六总”。为了方便杜撰罪名，在办案过程中把它的名称变成“刘总”，意为“刘少奇总司令部”。再凭空加上“司”，成为“刘总司”。再把“司”强行变成“师”，最后成为“刘总师”，意为“刘少奇总司令部的一个师”。简直就和变戏法一般。通过残酷的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把这个群众组织打成一个反革命暴乱集团。共有29人被判处死刑。展览会上有巨幅的临刑照片，场面非常恐怖。据后来的揭露，办案过程中还打死、逼死53人。其他受害人不计其数。镇压“刘总师”当时被作为“一打三反”的重大成果大肆宣传，轰动全地区，全省。1982年陕西省委“平反”“刘总师”冤案。这已经是12年后的事了。

在运动开头的半年内，商南县有两人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两人都是公社社员。家庭成份都是贫农。第一名叫聂进福，是20多岁不到30岁的男青年，试马公社人，陕西武功农校肄业生。被搜查出写有“反动日记”，“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聂进福不服死刑判决，说“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都没有判死刑，为什么判他死刑？军管组的回答是：处理“三家村”是中央的事，与你无关。聂进福被处决后，他的叔叔到县城附近的刑场收尸遭到阻拦，第二天才用架子车一步一步翻山越岭把尸体拉回10多公里远的老家埋葬。第二名叫党广林，40多岁的单身汉，赵川公社人。“恶毒攻击”言论是：毛主席好个逼，叫人饿肚子。刘少奇好，分自留地，有饭吃。党广林接受死刑判决，说：我骂毛主席，该死。党广林被处决后无亲属收尸，县军管组只好叫人掩埋尸体。

## 2.了解得最详细的案件

吴圣章，40多岁的中年男人，家庭成份地主，湘河公社社员。吴圣章1949年以前在西安市大兴善寺佛学院学习佛学。吴圣章是佛教徒，与世无争，平日很少与别人来往。吴圣章算是有文化的人，在家有空闲时写诗作文，大部份有关佛教。写完把本子往挂在走廊的一个篮子里一扔，从不给别人看。“一打三反”运动来了，被怀疑上了。民兵从他家里搜查出诗词本，挖掘罪证。

“莫笑地主无政权，无地无权自清闲。六月苍蝇落汤客，无辜埋葬李海宾。”说的是地主分子李海宾被镇压的事。把这说成是地主分子发泄不满、为被镇压的同伙鸣冤叫屈，太容易了。吴圣章看见生产队的庄稼长得不好，写下“禾苗枯黄死，蓬蒿称霸王”。他的儿子因为家庭成份不好找不到对象，写下“为了成份难结婚”。这些都算是反动诗词，“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他写过一篇短文，把毛泽东思想比喻成老子的道德经、佛教的般若经。作为一个佛教徒，这些经在他心中都是神圣的。但是，他颂扬的本意被定性为“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由于他上过大兴善寺佛学院，被怀疑是从佛学院潜伏下来的特务，县军管组还专门派人到西安市去调查。调查没有得到证据，就称为“特嫌”。吴圣章家住离县城40多公里的偏僻山村，连公路都不通，被押送到县军管组逮捕判罪。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伸到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无人可以逃脱。

在给吴圣章定罪的县委常委会议上，县军管组办案人员汇报案情后，县武装部赖政委首先唱高调：吴圣章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应判处死刑。从省上来的下放干部王讯有不同看法，但他也不敢和“军”方唱反调。只听他先附和说：罪大恶极，死有余辜，那是肯定的。然后接着说：但是，是不是可以考虑留他一命，好挖出其他特务，这样成果会更大。很明显，王讯是要说无期徒刑。其他干部跟着说：是的，这样成果会更大。但是，赖政委不为所动，坚持要判处死刑。无人敢再表示不同意见。群众代表齐声附和说：杀！这个案件以死刑上报。省上批下17年徒刑。吴圣章免了一死。但是，因为写了这些诗句，就被判17年徒刑，也太冤枉了！

## 3.最荒唐的案件

阮英武，20多岁的男青年，家庭成份地主，城关镇人。因为有人揭发，阮英武对着墙上用红漆喷成的毛主席头像说：象狮子头。尽管他否认，还是以“恶毒攻击毛主席”罪被判处5年徒刑。

余导贵，50多岁的中年人，男，家庭成份贫农，湘河公社社员，生产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主席。“一打三反”运动期间，余导贵在批判斗争大会上经常带领喊口号。有一次，把“拥护毛主席、打倒刘少奇！”喊成“拥护刘××、打倒毛××！”被扭送县军管组。他坚持说，他不是故意而只是一时糊涂喊错了。结果是教育释放，撤销贫协主席职位。

童老三，16岁，男，中学生，湘河公社人。被少年同伴揭发，有污辱毛主席、江青的言论（恕不在此重复）。案发后外逃。被从宝鸡市姐姐家里抓捕回商南县。结果是教育释放。

一小学生，男，其它情况不详。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手持一支粉笔，遇到墙壁时，就把粉笔触墙，边走边画出一条齐胸高的白线，口中还念念有词“嗤嗤嗤……嗤嗤嗤……”，觉得这样很好玩。有的地方，白线从低处的毛主席语录和像上划过。小学生被当成反革命扭送县军管组。结果是：关押一段时间后，被释放回家。小孩认不得回家的路，军管组只好派人送他回家。

“叛国”案。姓名等情况不详。起因是买了一本中国地图册，被怀疑企图叛国。根据本人的口供，在地图上找路线，想从内蒙古偷越国境，逃往苏联。被扭送县军管组。处理结果不详。

“特务”案。龙窝公社有一个青年人，卧房里安有一个农村有线广播喇叭，有一个拉线开关可以控制喇叭的通断。这个小伙子手贱好动，闲来没事就躺在床上用手乱拉开关玩。因此，有线广播断断续续，有点象无线电发报机的嘀嗒声。这种声音被人听见，小伙子被当做特务扭送到公社。公社干部找到龙窝公社小学附设初中班的杨老师，问这样能不能发电报。杨老师是西安交大无线电系毕业生，听了之后差点笑死了。不用多说了，公社干部听了杨老师的回答，就把小伙子放了。唉，商南县少抓一个特务。

□ 原载《华夏快递》2014年1月25日

~~~~~

【亲历者言】

文革中我给江青做秘书（二）

• 阎长贵 •

（上接zk2004c）

四、我怎样给江青做秘书

我任江青秘书，都要做些什么事？

江青不需要我帮她写东西。她的讲话多是她的即席发挥，或是事先自己准备的。她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讲演才干。在我担任江青秘书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一次也没有为她起草过讲话稿，她也从来没有对我提出过这方面的要求。

我做江青的秘书，日常主要工作是收发和管理文件。当时江青的文件不少。大概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康生有的文件她都有。就类别讲，有中央文件和收发电，有军委文件和收发电，中央文革的文件和收发电，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搞的《简报》、《要事回报》、《快报》、《来信摘要》等等。所有这些东西，每天都有几十份，甚至上百份，摞在一起有半尺厚，字数有一二十万字。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儿送给江青，莫说看了，就是一份份数一遍也需要不少时间。可是，我又不能不把这些文件都给她，因为如果她听陈伯达或康生说看了什么文件或材料，而她没看到，那她就要骂我了，说我“扣了”或“贪污了”，罪过就大了。所以每天对文件和材料进行分类，是我最重要、最费脑筋、也是最花时间的的事情。我把文件和材料大体分作三类：

一类是必须看的。包括中央文件，中央负责人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间的传阅件；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和其他要人给她的亲启件；文革的重要事件和重要动态；党和国家历史和现实的重要事件和重要动态；有关部门或个人直接请示她的信函和材料，等等。这一类东西，都是属于她应当了解的，而且多数也是她需要表态的。据我回忆，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领导人中，对文件和材料做出批示发表意见最多的是江青，其次是康生；陈伯达很少，他往往只是划个圈。

一类是供参阅。这类文件和材料，一般说来也比较重要，但并不一定需要批示和表态。

还有一类是供浏览。这类文件和材料，对江青来说，有时间可以翻翻，没时间不翻也关系不大。

这三类文件和材料，分别放在三个卷宗中，每天江青起床前，我要把这三个卷宗送到江青办公室，放到江青看文件坐的沙发的右边茶几上。有些中央负责人之间的传阅件，或写着“急件”和“特急件”，机要交通送来后，除非江青没起床，都要立马送给她，不能延误。江青把文件看过后，或批示，或不批示，都顺手放在她坐的沙发的左边的茶几上；她批示的文件和材料，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一般的，由我按照她的批示，写信封装好交给机要交通员送走；一种是她写了信封，如送给毛主席、林彪、周总理或陈伯达、康生看的，她甚至已封好，贴上了密封签，这是秘书不可与闻的，我只负责登记，交机要交通员送走。一天两次，即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从她办公室取下她看过和批示过的文件，该登记发走的发走，该分类存档的存档。如有紧急件，她会随时按铃让我去取，我会立即通知机要交通员来取并送走。

一般说来，第一类的文件，江青都看了，卷宗经常成空的；第二类的文件，她会挑一些看，也有批的，或划些横道；第三类文件，即“浏览”，她看的或批的很少，有时根本没动过。我每天处置文件和材料的程式基本如此，日复一日。

江青在第一次和我正式谈话时就跟我说：她连每天是几号、星期几都不知道，只知道工作，不知道休息，没过过星期天。为了补足她这个“缺陷”，我每天上午给她送文件时，都在第一份卷宗的上面用曲别针别一个小纸条，上写：今天是×月×号，星期×，上午×点，下午×点或晚上×点有××会议，以便她了解这一天的安排。我每天除了收发和管理文件外，还要接电话。电话很多，有通知江青开会等事情的，有向江青请示什么而又不便直接打

给江青的，有要见江青让我同江青联系的，等等。有时电话一个接一个，加上收发文件，忙得不可开交。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这本书中说我是江青的“机要秘书兼江办的办公室副主任”。

这是一本胡编滥造的书。因为林青山侵犯了我的名誉权，同时也给历史造成了混乱。我不得已曾起诉他到北京市中级法院，并获胜诉。你所提的问题，我正好借此机会把它澄清一下。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别说我当机要秘书时，就是整个文革十年中，江青除了有一个自己工作的办公室外，中央办公厅没有另外给她设过为她服务的办公室，至于江青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云云，当然也就是子虚乌有了。我给江青往外发信或文件时，由我所写的信封，落款都是写“江青同志处”。外人对江青这里常有称“江办”的，那只不过是一种想当然的含混的称法。

至于林青山这本书的胡说八道，我在后面还会多次提到。

我的工作量大，几个月下来，疲惫不堪。在文革期间，江青的事不比陈伯达、康生少，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说，可能还要多些和忙些，他们的秘书都不止一个。我跟江青说过多次：“一个人忙不过来，希望再加一个人。”这件事我跟我的顶头上司中办主任汪东兴也说过，他说那得看江青的意见。一开始江青也没当回事，后来，我可能说了多次，也可能是汪东兴也跟她说过，在一次送文件时，她和我说：“我看你是挺忙、挺累，可是，主席才用一个秘书，我怎么好用两个秘书呢？！”停了一会儿，她又说：“不过，我们都是主席的秘书。你忙点、累点，还是先干着吧！”我答应说：“好，谢谢江青同志，我一定努力干。”

关于江青所说：主席才用一个秘书，需要交代几句。在1967年，我给江青做秘书时，给毛主席收发和管理文件的机要秘书确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徐业夫同志。毛主席身边的秘书有两种，一种是职务和水准都比较高的帮助毛主席研究和处理某方面问题的秘书，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都长期做过毛主席的秘书工作，一般说来，他们同时都还在党内和政府内担任着一定的比较重要的职务；一种是职级较低、专给毛主席处理具体事情的秘书，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注释中，他们被称作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1956年，中央常委会为毛主席任命了五大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江青、田家英，他们分工各有不同。他们中间，只有江青一人例外，只作为毛主席的专职生活秘书，同时帮助毛主席研究一些国际问题。其他四个人都任有重要职务：陈伯达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后还兼任《红旗》杂志总编辑；胡乔木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闻总署署长；田家英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叶子龙任中央机要室主任。

1962年3月25日，毛泽东给邓小平、杨尚昆等写信说：“我这里的两位秘书，文化、政治水准都低，不能很好地替我阅选内部文件，更不能向我提意见，需要有一位文化、政治水准较高的同志来帮助我。此人最好是在地方群众工作中有过实际经验的。如能找到，也要讲明试用，不行另选他人。至于‘收发’性质的秘书，有一人够了，可以减去一人。”徐业夫同志大概就算是这样“收发”性质的秘书。

徐业夫，安徽人，老红军，是一位工农干部，人很好，长我二十几岁，是我父辈的人物，我很尊重他，我曾向他请教怎样做江青的秘书。他向我讲了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你要以江青同志的意志为意志。”当时我听了很不顺耳，觉得有损自尊心。后来明白，这句话不只是他长期做秘书工作的经验之谈，也是他对江青为人品性的了解，告诫我：江青的意志违拗不得。这是一句掏心窝的话。尽管当时听了不很自在，但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我给江青做秘书工作，一直是恭恭敬敬、勤勤恳恳的，江青的意志（如江青叫我办的事）我一次也没违拗过；但这并不是说，我在江青面前唯唯诺诺，一句话也不敢说，一点看法也不敢谈。我是一个读书人，一个“小知识分子”，有时还好谈点自己的看法；不过我向江青谈的有限的一些看法，凡涉及她的，都是为她好，觉得有利于维护她的形象，在主观动机上决无其他——至于她本人是不是这样认为，或真心实意地这样认为，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我可以说是日夜忙碌，不敢稍许懈怠。除非江青午休或夜里睡觉，我一时一刻不能也不敢离开办公室，因为不知江青什么时候按铃叫我；如她按铃叫我，我不在，那可不得了了，一你就等着挨批、挨骂吧。

记得1967年夏天，有一次，江青按铃叫我，恰好我离开办公室一会儿，待回来还没进办公室，就见江青的护士匆匆跑来，看到我就说：“你干什么去了？首长叫你！”我心想糟了，也顾不得向她解释，就赶快上楼到江青办公室。“报告！江青同志，您叫我？”我……”江青根本不听我解释，两只眼睛直瞪着我，声色俱厉地大喊大叫：“谁叫你离开办公室的，你误了我的事，你负得起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说：“江青同志，我错了，以后一定注意！”江青仍然很生气，没头没脑地说：“真是，我用不起你这大知识分子！”对这话，我心里感到很委屈，又不能说什么。大概有好几分钟的时间，江青的态度才有所缓和，她说：“还愣在那里干什么！快把这封信发走。”我忙接过信，就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待我下楼回到我的办公室，才松了一口气，觉得躲过了一劫。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一看是她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上面写着“急件”，并已封好；至于什么内容，我不知道。我立即通知机要交通把这封信取走。闹了这么一场事，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江青说“我用不起你这大知识分子”，狠狠地刺伤了我。在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中，就学历来讲，多为初中生，也有个别的高中生或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她的护士就是卫校毕业，大学生只有我一个人，但我从来没有因此而骄傲，工作就不认真。

有一次我和戚本禹谈起这件事，他跟我说：“挨江青的批评，也是一种光荣呢！你想全国这么多人，能有几个人可以直接挨江青的批评？”我想这是一种“阿Q精神”，——在江青身边工作有时也确实需要有点这种“阿Q精神”，否则，怎么办呢，你又不能跟她辩解！

在江青身边工作，和江青的关系，就是形同仆人和主子的关系。江青居高临下，要你对她绝对服从，如同使奴唤婢，经常板着一副面孔，不苟言笑，她不高兴或有什么不满意的时候张口就骂人，甚至大声斥责：“你给我滚！”

刚才说到江青按铃叫我，顺便再说一下林青山那本书对事实的编造。《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中不止一次地说，江青打电话叫我。如该书第42页说：“笃笃笃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沉思，他拿起电话：小阎，你来我屋里有事！”第49页又说：“笃笃笃电话铃响了，小阎拿起电话听筒，小阎，来我这儿有事。”这是瞎编，完全不了解江青呼叫工作人员的情况。其实，任何一个中央负责人呼叫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是用电话，都是按电铃，江青也如

是。从江青的办公室、卧室以至餐厅都安装着通往护士、警卫员和秘书房间的电铃，江青一按电铃就可以叫到我们中的任何人。按规定：电铃响一下，是叫秘书；响两下，是叫护士；响三下，是叫警卫员。这些所谓“纪实”作品的编造，到了不知起码常识的地步。

说到文字工作，我只帮江青推敲过一次她的讲话记录。1967年11月9日和12日晚，江青和陈伯达、康生召集中直文艺系统部分单位的军代表和群众代表开了两次座谈会，她发表了讲话。根据录音整理的她的这个讲话稿，江青让我看看，推敲一下。我对这个讲话稿做了一些文字通顺工作，就内容讲，我只加了一句话，这就是：“样板是尖端、是榜样、是方向。”“尖端”、“榜样”这个话，江青讲了，“方向”可能是我新添的。江青这个讲话，陈伯达吹捧说：“讲得很好，很好！”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迅即转发全国，让人们学习和贯彻。

江青对我的工作，一般说来，还比较满意，关于挑选文件她也没提出什么问题，在这方面，我回想不起印象很深的事情。当然，这种情况是有的：我认为重要的、必须看的，她不一定看；我认为不很重要，可看可不看的，她不仅看了，而且写了批语——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好好想一想，以改进工作，以适应她的需要。

我还要提一下林青山的《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这本书，书中写道江青对我说：“从年龄上说，你是我的晚辈，我都拿你们当孩子。”她亲昵地拍拍小阎的肩膀，“只要你能忠于我，将来你们从这里出去，都是独当一面的头面人物，说不定还是一路诸侯哩。但必须使我信得过才行。我看你是个老实人，好好干吧，将来会有你的锦绣前程的。”还写道：她哼了一声，“反对我的人，决不会有好下场！”也许过于兴奋，亲昵地拍拍小阎的肩膀：“好好跟着我干吧！把这些老家伙们一个个都打倒了，天下不就是我们的了。那时，大权在我们手里，我说什么算什么，给我干事的人，我还能亏待吗！只要你好好帮助我干事，忠心耿耿，一心一意，能赴汤蹈火，将来会有你的前途的。”（见该书275页）

实际上，江青从来没跟我说过这类话，她也不会说出这类的话，还有什么“拍拍小阎的肩膀”，更是扯淡。论年龄，江青确实是我的长辈，她比我亲生母亲还长一岁，日常相处，她是自重身份的，决没有“拍拍肩膀”之类举动；对她，我也确实“忠心耿耿，一心一意”，真诚地把她看作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执行者和代表者。江青跟我说的政治方面的话，都是冠冕堂皇的；她如果确实像林青山所说那样跟我讲，而我又认可和满意，那我还有什么人格可言！林青山这样编造是对我的严重污辱和诋毁！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林青山根本不懂得、不了解江青这样的历史人物，不了解江青的问题和罪行之所在，一切全凭想当然，这何尝不也是对江青的诬陷？

五、江青也和我聊过天

前面我说过，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关系，是统治与服从、主人与仆人的关系。她不高兴或有什么不满意的时候，张口就骂人。但她心情好的时候，也和工作人员聊聊天。我就有几次这样的经历。

有一次我陪她散步，她问我家庭生活怎么样，我告诉她，还可以。我家庭出身很苦，解放后，土改时分了几亩地，生活有很大变化。我当时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行政22级，在北京地区，工资是56元，上有老，下有小，老家在鲁西北，地瘠民贫，生活很紧张，但我从没跟她说过有什么困难。江青也问过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没有。我说，我在旧社会里逃过荒，要过饭，要不是解放，我不会有今天。当时这样说，是真心话。大概也因为这样，江青对我说，我看你对党，对毛主席还是有感情的，说我“还有点劳动人民味道，还没

被化掉。”（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听到江青这样说，我感激地说：谢谢江青同志！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一书中说，江青跟“阎昌奎”（阎长贵姓名的谐音）讲：“听说你家里人口多，收入又少，有什么困难，不要顾虑，说一声，我批个条子，照顾一下不成问题。”江青还说：“把你的家信给我看看。”小阎从容不迫地从兜里掏出信递给江青，她粗粗地看了看，确实是父亲有病来信要钱。她顺手在一张便条上批了几个字：“救济小阎五十元。”（第159页）这纯粹是胡说。我确实从来没向江青和组织谈过我家庭有什么困难，江青和中央办公厅也没有给我批过一分一厘的“救济款”。

有一次她跟我谈到她在30年代的一些情况。她说，那个时候，我搞文艺工作，搞地下工作，经常要跟特务斗。比如演戏吧，我在前台，一方面要认真表演，一方面还要注意下面有没有特务，或者远处来没来特务，如果发现有特务嫌疑的人，我就马上下场，到后台换上衣服就溜掉了，免得被敌人抓住。她说，做革命文艺工作，做地下工作，那是有生命危险的，我不怕！有一次，她跟我谈到毛主席在指挥打仗时的高超艺术。她说，在转战陕北时，我一直跟着主席，主席指挥打仗，不仅能指挥自己的军队，也能指挥敌人的军队，叫他往哪就往哪，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我没当过兵，打过仗，对江青说毛主席指挥艺术，理解不深，后来江青诬我为“坐探”，把我关了监狱，在监狱里读《论持久战》，看到毛主席说“调动敌人，就我范围”，才进一步比较深刻地理解了江青说的毛主席的指挥艺术。

江青在和我聊天时，不止一次怒气冲冲地谈到刘少奇。她说：1964年夏天，我听过刘少奇的一次报告，他一方面大肆鼓吹他老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一方面竭力贬低毛泽东思想，他说在“四清运动”中了解情况用毛主席开调查会的方法已经不行了，开调查会，他不跟你说真心话，只能“扎根串连”，一个一个、一户一户地来。江青说：我听后感到很吃惊，连肺都气炸了，我都哭了，马上去向主席报告。我跟主席说，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死后做秘密报告反对斯大林，而你还健在，人家就公开做报告反对你了，你就无动于衷吗？毛主席怎么反应，江青没跟我说。

江青有一次还跟我谈到她和毛主席的收入和生活情况。她说：现在孩子都大了，李讷、毛远新都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我和主席的工资，除了吃饭、穿衣，就没有什么花费了。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吃什么山珍海味。最后嘱咐我：这件事你告诉东兴同志，让他注意这个问题。还说：我的党费是不是按时交了，你也告诉东兴同志，他不要忘了帮我按时交党费。

江青还有一次简直是和我开玩笑。在一次从钓鱼台去中南海的汽车上，她两边坐着她的护士许春华、服务员张素兰，她们都是没结婚的女孩子。我当时除了做机要秘书，还临时代理警卫员，我坐在司机右边警卫员的位置上。江青说：“长贵同志，听说你都有两个孩子了！”我说：“是，江青同志，咱们山东习惯不好，结婚早。”她接着说：“生那么多干吗？尝尝那个滋味就行呗！我这一辈子就只生了一个孩子。”我本来是一个好害羞的人，江青这样一说，搞得我面红耳赤，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